

一战后日本的对外交涉

从巴黎和会至华盛顿会议

成晓雪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一战后日本的对外交涉

从巴黎和会至华盛顿会议

成晓雪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战后日本的对外交涉：从巴黎和会至华盛顿会议 /
成晓雪著.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3. 3

ISBN 978-7-214-27481-6

I. ①一… II. ①成… III. ①外交史—日本—1919—
1922 IV. ①D831.3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2)第 163844 号

书 名 一战后日本的对外交涉——从巴黎和会至华盛顿会议
著 者 成晓雪
责任编辑 郑晓宾
装帧设计 张晓彤 郝桐一
责任监制 王娟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8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19.5
字 数 290千字
版 次 2023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23年3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27481-6
定 价 98.00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绪 言	1
第一节 研究动机	2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6
第三节 研究资料说明	27
第一章 善变的“青岛”归还之约	33
第一节 硝烟弥漫山东半岛	34
第二节 “亲善”之下的阴谋	56
第三节 迟来的政策转换	68
第二章 博弈巴黎和会	94
第一节 和会辩论山东归属	95
第二节 “小幡公使恫吓传闻”	102
第三节 强权的胜利	117
第三章 山东问题国际化	142
第一节 水面下的交涉与中国拒签	143
第二节 《内田声明》	160
第四章 探路直接交涉	182
第一节 第一次直接交涉提议	182

第二节 试水私人磋商局部突破策略	205
第五章 华会动议下的主动出击	217
第一节 华会的提起与日美交涉	219
第二节 第二次直接交涉提议	227
第三节 曙光乍现——“边缘谈判”构想	234
第六章 “边缘谈判”	242
第一节 各方促成“边缘谈判”	244
第二节 中断危机	252
第三节 最终解决	263
结 论	284
参考文献	292

绪 言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一贯主张重视日美协调的原敬上台组阁。为适应战后东亚格局的变化，回避孤立危机，原敬内阁调整战争期间以军事、政略为特征的独占扩张政策，引导日本外交转向“对美协调”与“日中亲善—内政不干涉”为基轴的国际协调外交路线，以图缓和日美对立，改善中国对日反感。

一战期间日本借口“英日同盟”对德宣战，占领胶州湾租借地与胶济铁路^①及其附属矿山，引发战后山东权益归属问题，是为日本一战期间侵略政策的表征。山东问题在巴黎和会成为中日两国争论的焦点，在经历“直接交涉”期之后，历经四年，于华盛顿会议终告解决。不仅是一战后日本原敬内阁面临的主要外交课题，其走向也深刻牵动着东亚国际格局与远东和平。因而山东问题的交涉过程研究，可以说是探讨一战后日本对外政策转换与外交实践，检验转换实效的绝佳案例。

本书拟充分利用未刊、已刊档案史料，通过实证研究与文献分析法，以全球史观为指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至华盛顿会议（1919—1922）为主要研究区间，将山东问题的提起、博弈、交涉、解决作为主线，分巴黎和会前、巴黎和会期、两次会议间隔期、华盛顿会议期等四个阶段共六章，考察一战后国际潮流新动向、东亚国际环境巨变的现实背景下，日本进行对外政策转换、展开政策实践的过程。并尝试对其交涉实践中遭遇的困境、推动问题解决的内外动

① 按：书中引文或间接引用所言“山东铁路”“济南铁路”均指胶济铁路。

因做深入探讨,借以重新审视这一时期日本外交的特质。

第一节 研究动机

中日两国学界对一战后(巴黎和会至华盛顿会议)日本对外政策的研究主要是从国际关系史或政治外交指导者——首相原敬的外交思想等两个视角,来解析外交政策的形成与展开。尽管迄今为止研究成果颇丰,山东问题相关的专题研究也不在少数,但仍有几点值得商榷。

缺乏“外交群像”的塑造

过去对于一战后日本外交与对外政策的研究,常以原敬的外交指导为主要对象,成果颇丰。其研究多关注原敬外交战略思想与外交政策实践,并在此框架内从各个角度展开“原敬外交”的“新旧”之争。或认为其思想本身存在“旧外交”与“新外交”的不同侧面,或认为“原敬外交”的实践与其思想未必相符,“旧外交”的一面只是其作为首相为平衡各方政治势力做出妥协的结果,是其现实主义作风的体现。

相关研究集中于原敬,却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影响外交政策形成、对外政策实践的其他外交担当者的存在。不可否认,原敬的外交指导奠定了这一时期日本对外政策的基调,但其决策的具体实践、对外交涉的临场表现,及与之相应的对外观感却与其他外交担当者密切相关,外交色彩不特为某一人所垄断。将这一时期日本遭遇的外交困境归咎于原敬外交思想的缺陷,或是将日本外交和平理念、“进步”思维的释出归功于原敬,都是有失偏颇的。

一般认为,与缺乏领导才能的外相内田康哉相比,首相原敬性格强势且具有卓越的领导才能,在主导外交政策的确立方面占据上风,但在外交事务的具体处理过程中,两者仍然存在一定的差异,尤其在华盛顿会议开幕在即原敬遇袭身亡,此后日本的策略抉择在延续原敬政策的基础上,也带有内田个人的印迹。

事实上,日本外交本身也存在群体决策的一面。麻田贞雄指出,除了日本外交本身存在的集团决策倾向,“内田外相缺乏强有力的领导能力,因而无法充分发挥政策调整者的机能,也没有形成(外务)省内一致意见的能力。其

结果是,政策决定的中枢存在由外相下移到‘中坚层’(局长、参事官、课长等)或是在外使馆的强烈倾向”^①。除了外务省“中坚层”与在外使馆,巴黎和会与华盛顿会议的全权代表在外交议题上的立场与影响也不容忽视。会议过程中,作为决策核心的原敬、内田康哉都没有亲自到场,通讯技术的局限造成政府在事实上无法对代表团形成完全有效的掌控。随着会议进程的迅速推进,代表有时需要抛开政府指令做出临场判断,而这种附带现场色彩的个人决策,往往在事后被追认为政府决策。一战后国际形势巨变、外交思潮新旧交替,这些外交的现场担当者如何认识与应对世界形势的发展,如何看待与接纳新的外交思想、外交理念的产生,如何在外交政策的制定与交涉实践中体现自己的立场与观点,同样值得关注。

这些特征使本研究在关注外交指导者原敬之外,也重视作为外交政策制定者的外务省“中坚层”与交涉实践担当者的一线外交官等“外交群像”的塑造,避免将这一时期的日本外交决策、交涉实践与“原敬外交”完全画上等号。

中国作为“外交主体”角色的缺位

这一时期日本外交的主要议题包括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两次国际会议,“停止援段”与劝告中国南北议和、新四国借款团与“满蒙除外”、山东问题、直皖战争与“中国内政不干涉”政策、西伯利亚撤兵问题等。除西伯利亚撤兵问题外,皆与中国相关。“原敬外交”的两大基轴,即中国问题上的对美协调与对美协调下的“中国内政不干涉”,归根究底也都针对中国而言,中国在其对外事务中的比重可见一斑。然而,迄今为止的研究,除了解析原敬的外交指导,就是以东亚格局下日美关系的展开为探讨重点,在具体的对外交涉议题上侧重日与美、英等国协调过程的考察,极少关注中国动向与中日交涉的展开。

以国际关系史为视角的研究,强调国际环境变化与国家实力在地区格局中的话语权,因而日美关系或日美争霸自然成为探讨一战后东亚国际关系的核心问题。加之在东亚地区仍具有强大影响力的英国,导致日本外交史研究偏重以日、美、英三国的相互作用作为分析主体,探讨日、美、英在重大问题、

^① 麻田貞雄:《ワシントン會議と日本の対応》,入江昭、有賀貞編:《戦間期の日本外交》,東京大学出版会,1984年,第38—39页。

重大事件中的策略选择与相互协调过程,多数情况下仅仅将中国视为列强角逐的舞台或亟待解决的“问题”,而非作为相对独立的外交主体。如果说中国学界的近代日本外交研究(也包括中日外交关系史)是一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史”,那么日本学界则更倾向于将之塑造成“日本与列强关系史”。

应该说,甲午战争以后,中国在东亚国际政治关系中确实存在双重身份。帝国主义时代的列强诸国,以中国为舞台,相互对立、牵制、同盟、协调,为实现本国利益的扩张而行动。这一关系中,中国是列强外交展开的舞台。另一方面,作为列强活动对象本身,中国也在为革新社会、提升国际地位、参与国际社会而努力,在这一层面上,中国又是对外关系的主体。帝国主义国际秩序下,中国作为外交主体的角色往往被排除在国际秩序之外,仅剩他者“舞台”的身份设定。重新审视“中国问题”上日、美、英等国的对立与协调关系,不应将研究视角局限在中国作为“舞台”的角色之上,也应关注作为外交主体的中国的决策影响与外交表现。

若其他问题尚能简单定义为列强需要考虑的“中国问题”,那么山东问题中,中国是显而易见的交涉主体。然而,日本学界关于山东问题的专题研究,极少关注北京政府的立场表达,更多的时候只是将其行为程式化地视同列强附庸,或将五四以后中国在山东问题上的立场,笼统归结为“民族主义冲击下的拒绝主义”。巴黎和会至华盛顿会议期间山东问题相关的研究,也多以讨论日美交涉为主。这种研究盲区导致日本学界对中日间的接洽与交涉、中国动向对日本决策的影响关注不够,研究不足,很大程度上局限了山东问题专题研究可能扩展的空间,进而影响这一时期日本对外政策的整体评价。

抛开过去的视野局限,重视中国“外交主体”角色在日本对外决策与交涉实践中的影响,是本研究得以展开的重要缘由,也是区别于以往研究的主要特征之一。而对于中国“外交主体”角色的重视,也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客观地看待这一时期的日本外交策略与交涉实践过程,获取新的理解与认识。

基于民国北京政府外交研究的进展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中国处于民国北京政府(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北洋外交上承晚清外交,下联国民政府的改订新约和抗日外交,既是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影响最大的时期,也是民族意识觉醒,民族主义勃兴的时代。过

去日本外交史研究领域对于中国“主体”视角的忽略,虽与研究者对近代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客体化定位有关,也与北洋外交研究的现实有关。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北洋外交研究起步较晚、过去评价较低,无从为日本外交史、对外关系史研究提供必要的参考。

近年来,随着外交资料陆续出版、外交档案逐步公开,北洋外交研究迎来快速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的北洋外交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研究成果丰硕。主流观点在整体上倾向肯定民国北京政府的外交努力,通常将1914至1922年,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到华盛顿会议期间的中国外交视为中国谋求突破国际旧秩序的束缚,捍卫国家主权的过程。^①“当时国际承认的北京政府基本上采‘联美制日’方针,借参加欧战,取得参与巴黎和会资格,加入国际联盟成为创始会成员国,又参与华盛顿会议,成功加入西方列强主导的国际新秩序”,努力摆脱帝国主义对华控制,缔造了不俗的成果。^②同时,北洋外交研究在参战问题、修约外交、内政与外交、舆论与外交、外交近代化等具体议题上都颇有进展,这些研究又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唐启华所说“中国外交史研究,不注重外交常轨之交涉谈判,只注重谴责帝国主义侵略”^③的状况。北洋政府不再仅仅是列强的“合作者”与“代理人”,其在中外关系中的代表中国利益的“外交主体”角色得到了更多发掘。

北洋外交研究的进展,有利于我们了解民国北京政府作为外交主体的自我认识与基本课题,以及为解决国家面临的课题而采取的外交战略与政策。但是以研究现状而言,要在北洋外交史研究中分析出当时日本外交的形象却是困难的。北洋外交史研究以北京政府的决策过程与外交表现作为探讨重点,有比较重视一战后中美关系发展的倾向,对于日本的动向着墨较少,对其外交理解也多局限在“扩张”的固有印象里。

重要的是,北洋外交研究的进展使得将中国“外交主体”角色纳入日本外

^① 参考马振犊、唐启华、蒋耘:《北京政府时期的政治与外交》,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5—21页;马建标:《冲破旧秩序:中国对帝国主义国际体系的反应 1912—192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6页。

^② 台湾“国史馆”中华民国史外交志编纂委员会编:《中华民国史外交志(初稿)》,“国史馆”,2002年,第35页。

^③ 唐启华:《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2页。

交研究成为可能。本研究重视吸纳北洋外交的最新成果,为理解这一时期日本对外政策与交涉实践提供新的方向。通过不同研究领域之间的交流与对话,或许能为中国这一时期外交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日本的研究现状

本书以山东问题的交涉为主线,主要探讨巴黎和会至华盛顿会议期间日本的对外政策。尽管从历史的客观进程来看,这一时期处于大正天皇在位时期,属于“大正外交”的范畴,但正如信夫清三郎指出的那样,“大正期”这一时间概念只是一个偶然,并不具备政治史、外交史上的分期意义^①,日本学界一般习惯于以“战间期”指代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②。本书

^① 信夫清三郎:《大正外交史の基本問題》,《日本外交史研究—大正時代—》(《國際政治》1958年夏季特輯),第1页。按:信夫清三郎认为,大正时代的典型特征是针对官僚、军阀的大正民主运动,严格说来,在政治学上的分期应当是明治三十八或三十九年至大正十三年(1905/1906—1924),若非要以“大正时代”作为探讨外交史的分期,那么“大正时代”外交的基础问题就是大正民主主义运动如何规定外交政策,以及被大正民主主义运动规定的外交政策在现实中带来了怎样的变动。

^② 按:对于“战间期”的定义,一般认为,上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1918年或凡尔赛条约缔结的1919年,下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1939年或太平洋战争开始的1941年。(入江昭、有賀貞編:《戦間期の日本外交》,東京大学出版会,1984年,第3页。)不过服部龙二认为,从东亚视角来看,“战间期”应当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终结的1918年至卢沟桥事变爆发的1937年这段时期,这20年间,日本经历了三波国际形势的变化。第一波是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至1922年华盛顿会议,为应对一战后的东亚新形势,战后政权的担当者原敬内阁抛弃了过去以日英同盟、日俄协约为基轴的传统外交路线,摸索能够协调对外关系、改善与扩充权益的战后外交原型;第二波是华盛顿会议后,东亚秩序总体上渐趋平静,日本奉行“华盛顿体系”下的国际协调外交路线,但苏俄崛起与中国民族主义的勃兴,极大改变了东亚局势,这是币原喜重郎与田中义一面临的国际环境;第三波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本外交政策由维持现状转向突破现状,“华盛顿体系”终结。由于九一八事变是战间期的最大冲击,因而又可将战间期分为“战间前期”(1918—1931)与“战间后期”(1931—1937)。(服部龍二:《東アジア国際環境の変動と日本外交1918—1931》,有斐閣,2001年,第1—2页。)中国学者祝曙光则认为,“因为1931年以前日本的扩张是有限的、可控的、节制的”,因而从日本历史发展的角度而言,应当将1931年作为“战间期”的下限。(祝曙光:《徘徊在新、旧外交之间——20世纪20年代日本外交史论》,人民出版社,2013年,引言。)祝曙光对于“战间期”起止时间的划分,实则与服部龙二所指“战间前期”相吻合。

的研究区间在近代日本史中属于“战间期”范畴，是“战间期”外交研究衍生出来的一个重要分支，因而对于一战后初期日本对外政策的研究，自然离不开“战间期”这一大的时代背景。

“战间期”日本外交研究有两个争论焦点，其一是对于“华盛顿体系”的宏观理解，其二是“转换期”日本外交的评价。^①“转换期”的概念最初由三谷太一郎提出并为日本学界多数学者所接受，一般指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原敬内阁上台至华盛顿会议为止的时期，在外交领域，这一概念强调此时期日本国内政党政治联动下战后外交转换的意义。从日本外交研究史来看，华盛顿会议签署的一系列条约、协议构成的“华盛顿体系”是探讨“战间期”日本外交的基础，“转换期”外交的评价也建立在对“华盛顿体系”的理解之上。故本书将从“华盛顿体系”与日本外交、“转换期”日本外交两个角度，对研究现状作一回顾，以确认日本学界对“转换期”日本外交的基本认识。

“华盛顿体系”与日本外交

日本学界对于“华盛顿体系”的理解与评价，主要观点分化为以入江昭、细谷千博为代表的“华盛顿体系新秩序说”与服部龙二主张的“华盛顿体系旧秩序论”。

日本著名政治外交史学者信夫清三郎在1942年出版的《日本近代外交史》一书中谈到“华盛顿体系”与日本外交的关系。他认为，美国通过华盛顿会议实现了九国公约的缔结、英日同盟的废止与四国协约的签订、海军军缩等三大目的，这“三大目的相辅相成，是构成太平洋国际新秩序的要素”^②，华盛顿会议创建的国际秩序“华盛顿体系”以美国霸权为中心，“与大战后规定欧洲秩序的‘凡尔赛体制’一起，决定了此后十年的世界秩序”^③，尽管诸国内部存在诸多对立，但通过国际联盟与集团性机构来保障和平是当时的世界潮流。日本“外交政策为顺应体制而发生转变是自然而然的结果”，华盛顿条约的精神也成为此后“币原外交”的基调。为在日本外交政策中贯彻这一方针，币原提倡外交连续主义，主张通过列国协调来处理国际问题，尊重中国的合

① 服部龍二：《東アジア国際環境の變動と日本外交 1918—1931》，第4頁。

② 信夫清三郎：《日本近代外交史》，中央公論社，1942年，第264頁。

③ 信夫清三郎：《日本近代外交史》，第265頁。

理诉求,并以期待与忍耐的立场关注中国国民政治革新的努力。^①同时他指出,“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作为保障英美法诸国霸权的国际秩序,也隐藏着必然走向崩溃的要素。日本在华盛顿会议前后确立的政党政治,是保障“华盛顿体系”国际秩序的国内政治体制,因而国内政党政治的崩坏必然与打破“华盛顿体系”关联在一起。^②也就是说,信夫认为华盛顿会议是日本外交的分水岭,日本外交政策的转变是适应体系的自然结果。

50年代,日本学界马克思主义史学盛行,马克思主义史学对于华盛顿会议及其成果构建起的“华盛顿体系”整体评价不高,认为“华盛顿体系”及其体制下的1920年代,是造成日本孤立于国际社会的源头。“华盛顿体系”只是维持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权益的保障,在一定时期内缓和了列强在中国市场的冲突,延缓了帝国主义矛盾的爆发。江口朴郎在其著作《帝国主义与民族》^③中认为,支撑“华盛顿体系”的是国际帝国主义内部的利害关系。同一文脉下,江口圭一在《日本法西斯的形成》^④一书中提出了“两面性帝国主义论”,从军事、经济两个层面来定义日美英关系,他指出20年代的日本虽然在军事上逐渐独立于美英,但在经济上却依赖美英,这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固有矛盾,在对外路线上则分裂为亚洲门罗主义自主外交与对英美协调外交。

到了60—70年代,日本学界对于“华盛顿体系”的评价有了改变,入江昭重新诠释了“华盛顿体系”,他认为“华会是美国新外交的胜利,此新外交主张以经济合作协调列强利益,取代旧式帝国主义外交之利益交换与竞争,建立远东集体安全机制”。^⑤就华盛顿会议与日本外交的关系而言,华盛顿会议前,币原虽然认同列国协调主义,但那只是“旧外交”的范畴,而华会缔结的条约与协定无论是其内容还是精神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华盛顿体系”为日本外交提供了新的前进方向,意味着日本外交进入新时期,也就是以“币原外交”为代

① 信夫清三郎:《日本近代外交史》,第265—266页。

② 信夫清三郎:《日本近代外交史》,第273—275页。

③ 江口朴郎:《帝国主义と民族》,东京大学出版会,1954年。

④ 江口圭一:《日本ファシズムの形成》,日本評論社,1979年。

⑤ 唐启华:《北洋外交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金光耀、王建朗主编:《北洋时期的中国外交》,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8页。

表的“国际和平协调外交主义”路线,其主要表现为:1. 日本紧随世界潮流,放弃排他性政策,基于和平与正义的精神,贯彻国际友善与协调一致为基轴的外交方针;2. 经济至上主义外交思想,认为国际经济的相互依存是维持世界和平的原动力,确保与扩张海外市场才是增进国际利益的正确选择。^①

细谷千博从国际政治学的角度对入江的观点进行了补足,他认为“华盛顿体系”是日美英协调体系,是“以否定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帝国主义外交公式(即通过两国协作,牺牲欠发达民族利益,划分势力范围,以谋求政治、经济扩张的那种方式)为目标,尝试构建新的多国协调体系。是取代‘旧外交’,基于‘新外交’的东亚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实现”。^② 入江昭与细谷千博的“华盛顿体系新秩序说”奠定了此后数十年“战间期”日本外交研究的基本认识。而入江、细谷的主张,很大程度上也是对40年代信夫观点的一种回归与深化。

服部龙二在其著作《东亚国际环境的变动与日本外交(1918—1931)》一书中,对入江昭和细谷千博的“华盛顿体系新秩序论”提出了质疑,他认为无论是英国还是中国,在当时都没有“美国主导下的新秩序”这样的认识,“华盛顿会议中,日美英达成的核心共识是在中国问题上维持现状。三国的核心共识并不是对新秩序做出规定,而是在新秩序的摸索失败后,以旧外交的存续为前提,大致达成的旧秩序”。但他也强调,“尽管对于华盛顿体系守旧性的批判是容易的,但从理性的国际政治伦理考虑,日美英三国达成的共识是合理的结论。因为,如果不能给予维持现状的大国以与其实力相符的满足感,则难以维持稳定的和平”。“不过,中国外交官能够发现体系内改革的可能性,也说明华盛顿体系具有柔软性。”^③在此,服部提出了“中国外交”与过去“中国民族主义运动”这种模糊概念的区别,“中国外交”不仅包括国民政府的“革命外交”,也包括北洋政府的“修约外交”。将“北洋修约外交”纳入影响东亚国际格局的变量因素,与近年来中国近代外交史研究领域对北洋外交的重新认识不无关系。

① 入江昭:《日本の外交——明治維新から現代まで》,中央公論社,1966年,第87—88页。

② 細谷千博、斎藤真編:《ワシントン体制と日米関係》,東京大学出版会,1978年,第3—6页。

③ 服部龍二:《東アジア国際環境の変動と日本外交 1918—1931》,第6—9页。

“转换期”日本外交与山东问题

“战间期”日本外交的另一个重点，即“转换期”日本外交的评价。也就是说，一战结束后的巴黎和会至华盛顿会议这段时期的日本外交，究竟是处在“旧外交”的延长线上还是应当视为“新外交”的起点，成为日本学界争论的焦点之一。因本书以山东问题的交涉为主线，故本节拟在回顾日本“转换期”外交学术史同时，兼谈山东问题相关之研究，借以阐明山东问题交涉研究对“转换期”日本外交研究的价值所在。

“转换期”日本处于原敬内阁、高桥是清内阁主政下。原敬内阁在 1921 年因原敬遇刺身亡而告结束，但由于华盛顿会议的准备工作完成于原敬内阁时期，后继高桥内阁又承袭了原敬内阁的外交路线，在政策执行上具有连续性，加之“作为具有强大领导力的首相，原敬主导了‘转换期’外交，在这层意义上，把他开展的外交称之为‘原敬外交’也并不过分”^①。基于以上原因，日本学界对于一战后初期（即“转换期”）日本外交的研究，多以探讨“原敬外交”的方式呈现出来。

1960 年代以前，日本学界对于“原敬外交”的评价较低，小林龙夫与信夫清三郎的论述代表了这一时期的主流观点。小林龙夫在论文《巴黎和平会议与日本外交》中，以《翠雨庄日记》所载 1917 年至 1919 年临时外交委员会记录为依据，对日本参与巴黎和会的准备过程，以及日本在巴黎和会遭遇、处理问题的经过做了论述。小林强调，“原敬内阁的对华政策与大隈、寺内内阁没有本质区别，在确立日本在大陆的优势地位这一点上没有变化。原敬内阁开出的媾和条件证实其对大战期间大隈、寺内两内阁在中国获得的权益可谓寸步不让”，劝告中国南北议和也只是为了在和会贯彻山东问题上的主张^②，这种所谓的对华新政策“并不意味过去对华政策的本质性转换，而只是战术性

① 服部龍二等編：《人物で読む近代日本外交史 大久保利通から広田弘毅まで》，吉川弘文館，2008 年，第 235 页。

② 按：这一观点也出现在晋林波《原内閣における对中国政策の新展開——南北妥協問題を中心として》中。（《名古屋大学法政論集》第 143 期，1992 年 7 月，第 123—171 页。）

变更”。^①

信夫清三郎也认为,为应对战后新形势,原敬内阁修正日本在大战期间的国际政策,从过去的对英协调转变为以对美协调的修复与对华外交的改革为主的国际协调主义,其根底虽然含有本人一直以来的英美协调思想,但“并不意味着侵略政策转换,只是披着英美协调外衣的战术转换”^②。原敬内阁并没有打算放弃侵略获得的既得利益,“维护日本既得利益,与恢复和中国及美国为首的列强之间的协调本身形成了一组深刻的矛盾”^③,加之推动大战外交的旧势力的抵抗,其结果就是巴黎和会山东问题所表现的那样,“原敬内阁改变对华政策的意图,以及牧野的新式外交的伪装,只要谈到山东问题,就全部化成泡影,不仅没能恢复中国的信任,反而遭到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的猛烈抨击”^④。这一问题最终依靠美国斡旋,在华盛顿会议得以解决,日本不得不放弃或限制“通过大战及巴黎和会获得的最大成果——胶济铁路和矿山利权”,丧失了大战期间趁火打劫获得的很多特权。^⑤ 结合信夫对于“华盛顿新体制”及新体制下日本外交的理解,他将“原敬外交”定位为“旧外交”的延续。信夫清三郎的著作《日本外交史》在1980年被译成中文^⑥,他的观点不仅在日本学界,也在中国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50年《原敬日记》的出版,为日本近代政治史、外交史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基础材料,日本学界的原敬专题研究随之活跃起来,这种活跃也带来了“原敬外交”评价的变化。入江昭在1960年代构建“华盛顿体系新秩序说”同时,也开展了他的“原敬外交”论。相比小林、信夫对“侵略性”的强调,入江更关注原敬的对美协调与经济主义志向,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其外交的正面意义。

① 小林龍夫:《パリ一平和會議と日本外交》,《近代日本外交史の研究》,有斐閣,1956年,第374页。按:在同一文脉下,斋藤孝于1958年发表的论文《パリ講和會議と日本》在小林论文及其他先行研究基础上,对巴黎和会的日本外交做了总结。(《日本外交史研究—大正時代—》(《國際政治》1958年夏季特輯),第105—117页。)

② 信夫清三郎:《日本の外交》,毎日新聞社,1961年,第123页。

③ 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Ⅱ,毎日新聞社,1974年,第294页。

④ 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Ⅱ,第297页。

⑤ 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Ⅱ,第317—318页。

⑥ 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问题研究所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

他在《日本的外交》一书中写道：“原敬与币原认为美国与日本密切的经济关系对于日本而言至关重要”，“尤其是原敬，在出兵西伯利亚与中国问题上始终强调对美协调，自1918年成为首相以来，将对美协调作为日本外交的首要基准，其根本乃是经济主义的外交方针，认为只有和平的对外贸易投资的发展才符合国家利益，武力对抗徒增国家间摩擦，只会造成国库的浪费，而采取国际协同政策则有利于积极推进经济利益的发展”。^① 尽管入江也承认原敬与币原在日美经济依存与列国协调主义上的一致性，但他仍然认为“原敬外交”是“旧外交”的延续，以凸显华盛顿会议带来的跨时代意义。他强调，一战后初期的日本外交沿用“以特殊权益与势力圈的承认为前提谋求列国协调的帝国主义外交时代的原则，当美国、苏联逐渐进入‘新外交’时期时，日本的外交观念却裹足不前。这一点，即使是亲美主义的代表原敬也是一样”。^② 原敬在巴黎和会山东问题上的态度，“是帝国主义外交典型概念的表现”^③。

要说对后世影响最大，也是最早对原敬展开系统研究的日本政治外交史专家还属三谷太一郎。他在1967年出版的专著《日本政党政治的形成》中，首次用以人物为中心的写作手法和政治外交史视角，阐明了日本近代政党政治发展与对外政策转变之间的内在关联，探讨了原敬在日本政党政治形成过程中的指导作用，并重新定义了“原敬外交”与“华盛顿体系”及其体制下“币原外交”的关系，强调战后外交转换的意义。他认为，国内政治方面，原敬以政党的兴起促成大正民本主义发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首次将对美协调确立为日本外交基轴，为实现日美关系的安定与维持在华利益的并存，在中国政策上主张对美协调下的内政不干涉。为应对“转换期”状况而展开的原敬内阁的对华外交，尽管在“满蒙”特殊利益的固执上具有历史局限性，但在其展开过程中创造了“华盛顿体系”的各项条件，为“华盛顿体系”的成立铺平了

① 入江昭：《日本の外交——明治維新から現代まで》，中央公論社，1966年，第77页。

② 《日本の外交——明治維新から現代まで》，第82页。

③ 《日本の外交——明治維新から現代まで》，第83页。